

“文学真实”的维度

——读近期文学期刊想到的

□教鹤然

当思想与情感诉诸笔端,文学书写继而徐徐展开。个人经验与现实体验构成了文学写作者自我表达的肥沃土壤,富有生命张力的想象与虚构在这土壤中生发根系、抽长枝条,乃至花繁叶茂。一切有价值的文学表达,都不能脱离于历史化的具体存在经验,因此,真实是文学得以生发的基础与本源。也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文学的书写、阅读、评价与研究都始终难以疏离于对“文学真实”这种本质性概念的探讨。

近期,《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文学月刊以及《收获》《十月》《小说界》等文学期刊中收录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及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实践,都密切围绕着文学表达的真实观念而展开。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与细读,不难发现在文本的内部呈现出了如“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关系、“虚构”与“写实”的写作理念及实践形式、“真实”叙述的标准、尺度以及策略等诸多极具阐释空间的复杂面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趋近于“文学真实”这一概念的意义核心。

“创造真实”的写作路径

不论是对于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学真实”的内部都存在着“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两个基本层面,前者指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向的物质实体与真实存在,后者指的是文学主体基于个人化的审美感知和内心体验而产生的真实经验。自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复合体,但是试图从文本内在逻辑中抽离出真实的人事、物,或将其与现实世界建立某种必然性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证与寻找其意义甚微。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观照写作者创作与建构出的“文学真实”复合体,正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

近来,一种“创造真实”的写作路径逐渐浮出文字表面,凡一平的中篇小说《我们的师傅》(《十月》2019年第4期)、宋尾的中篇小说《从歌乐山上下来》(《十月》2019年第4期)、郑在欢的中篇小说《点唱机》(《青年文学》2019年第5期)和张

惠雯的短篇小说《雪从南方来》(《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等,都从不同侧面为我们讲述了寻找“真相”或揭露“真相”的故事,不断指引读者沿着写作者创造的路径去追寻一种可能的真实。相较而言,郑在欢的《点唱机》是一个略显另类的文本。故事的男主角“我”是一个连海明威都不知道的箱包质检车间工人,女主角小圆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文艺女青年。两人因小圆在公园摆设点唱机的摊位而相识,感情也随着认识和了解而逐渐加深。但是,当他们最终确定恋爱关系的那一晚过后,小圆却没有征兆地突然消失了,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小圆就这么消失了,只留给我一段不太真切记忆。我突然就想不起她确切的样子……越用力,往事就越模糊。”小说以“我”对于往事真相的回忆做结,并未呈现“我”与小圆这段感情因何而起又缘何而终的真实面貌,只是把这种对于真相的寻找权赋予读者。

可以说,前述作品通过“创造真实”写作路径的初步尝试,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延展层次和更为丰满的意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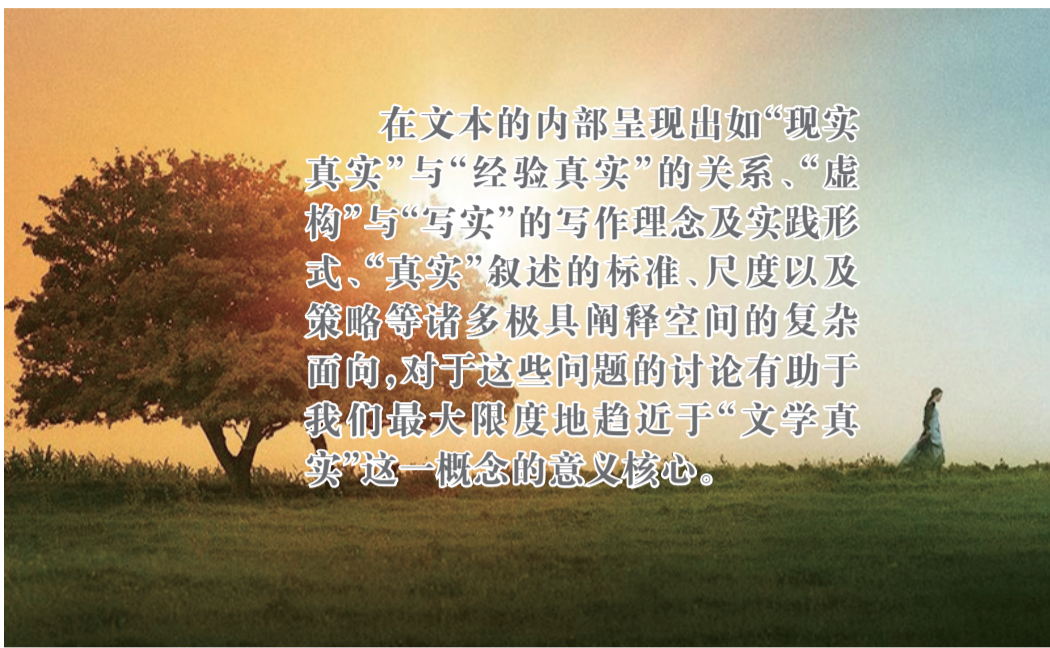
“虚构”与“写实”的实践形式

从“虚构”走向“写实”是早期朦胧诗人新近诗作内部暗流涌动的一种潜在创作倾向,诗人林莽的《只有时间能将复杂的事物趋于澄澈》(《人民文学》2019年第4期)组诗第一首《白头翁的叫声突然沉寂》中有这样一节:“昨夜大风刚过/就医归来/你在阳光灿烂的房间内静卧/鸟声清脆地响成一片/生活中那些往复纠缠的事物/让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沉于虚幻”。对照他早期的朦胧诗作《我流过这片土地》:“我发源于一个梦中/一个古老的梦境/山在沉睡/梦是一条河流/清晰地流往事/流过坚固的丛丛矗立的山峰一般的记忆/像我不知不觉地诞生”,不难发现“弃置写实,注重模糊”这种早期朦胧诗的美学特质已经完全褪去,“夜风”、“就医”、“卧床”等暗示年迈、久病的身体和垂垂老去的生命的写实意象取代了“梦境”、“记忆”、“诞生”等带有暧昧性、暗示性的抽象意象。相似的文风也出现在杨炼的新作《挽诗》(《山花》2019年第6期)中:“老年的直白/单弦单音/一只接一只器官/晾晒死/和你保持的/单线联系/一岁堆垒/一生的靠

哑/压低卑微的星球/你坐下/玳瑁黑框眼镜/拢着/悲苦/摘不掉的世纪/越回溯越长”。对照杨炼的成名作《诺日朗》:“我是瀑布的神,我是雪山的神/高大、雄健、主宰新月/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雀鸟在我胸前安家/浓郁的丛林遮盖着/那通往秘密池塘的小径/我的奔放像大群刚刚成年的壮鹿/欲望像三月/聚集起骚动中的力量”。“老年”、“聋哑”、“悲苦”取代了“神”、“奔放”、“力量”,时间的推延与身体的衰老成为诗人笔下的主要写实意象,这种从“虚拟”到“写实”的创作实践是与写作者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状态密切相关的。

以现实世界的实景作为文学叙事的底色是“写实”的基本技法,这一写作方法在新近小说中仍在延续,蓝石的短篇小说《故乡一夜》(《十月》2019年第4期),故事发生在“共和国长子”的重工业城市沈阳,读者可以跟随小说人物刚子、李响、韩羽一起走过沈阳市街头的西塔大冷面、五爱市场、万豪酒店、百乐门歌厅。在李亚的短篇小说《初冬》(《青年文学》2019年第6期)中,读者也可以跟随主人公“我”和妻子于小双在北京的街道穿行,而这种都市行走的麻木状态恰恰成为了写作者批判、嘲讽的对象。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城市人日常生活的“庸常化”书写范式在现代中国文学经典文本中已屡见不鲜,如若未能寻找到更具艺术突破性的思想结点,延续这种写作很可能使作品陷入“虚构”与“写实”的圈套中而耽于平庸。

“非虚构”这一文类的出现和写作实践,某种意义上是对现实主义写作和文学真实理念的深入探索。万方的《你和我》(《收获》2019年第4期)、冯桂林的《商之道》(《山花》2019年第6期)、白文峰的《家住七里村》(《黑松林文学》2019年第1期)、刘益善的《民间收藏纪事》(《莽原》2018年第2期)等非虚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日常生活口述史、文化史及社会史等不同面向的考察意义,同时兼具文学艺术与历史材料的双重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戏剧家曹禺女儿万方的作品《你和我》中,写作者用个人化的亲历经验为文字增加了重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勾勒同时代人们集体记忆的精神载体,同时更具有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成为触碰心灵、触摸生活、触及灵魂的艺术探索。



在文本的内部呈现出如“现实真实”与“经验真实”的关系、“虚构”与“写实”的写作理念及实践形式、“真实”叙述的标准、尺度以及策略等诸多极具阐释空间的复杂面向,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趋近于“文学真实”这一概念的意义核心。

“反真实”的叙事策略

这里所说的“反真实”,并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界所讨论的反对真实论的理论倾向,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写作手法及叙事策略。所谓“反真实”,指的是在文学创作中布设与“现实真实”相悖的事理逻辑,建构一种新的反向真实。在小白的短篇小说《婚姻风险》(《小说界》2019年第3期)和王侃瑜的短篇小说《语膜》(《收获》2019年第4期)中,这种“反真实”的真实叙述体现得尤为鲜明。

《婚姻风险》是一篇讲述未来人类婚姻风险管理系统的科幻小说,作者选择一种与现实社会存在的“真实”相背离的叙述逻辑,超越当下世界的“自我”意识,来最大限度地趋近人类社会本质的精神内核与本真的人性。小说的创作理念和幻想维度均非常具有延展性,但遗憾的是,作为带有故事性的文学叙事文本,写作者“讲故事”的基本手法却稍显逊色,使得思想骨骼上附着的文学血肉较为单薄。作者本人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文末所附的“自问自答”中设问“怎么这个故事写得那么平淡无奇?”并以“未来世界没有什么

戏剧性,也许这个就是最大的戏剧性”作为回答,显然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文学作品是想象延宕的产物,但是,当想象的能量太过于溢出叙事者本人对于故事的基本把握时,语言和文字就有可能成为践行某种思想的附庸和手段,甚至有“理念先行”的偏误,这是应该为我们所警惕的。

相比之下,探讨人类语言与情感关系的科幻小说《语膜》则是较为成功的文学实践。故事的结尾,母亲伊莎和儿子雅克双双佩戴上迷你螺旋塔状耳机,柯莫语语膜为两人提供双向翻译和矫正功能,两人的语言趋于一致,但两人的内心却愈来愈疏远。小说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语言的标准化、精确化、纯净化背后其实是文化、情感和思维的全面强制同化。当承载思想文化交流与社会情感交际等文明功能的语言成为禁锢我们的牢笼之时,“语言”演变为“失语”则是必然结果。这种“反真实”叙述策略,反而为我们指向了一种可能的真实面貌,构成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批判力与更为明晰的现实指向性,从“反真实”指向“真实”最终实现“超真实”,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张力的写作尝试。

■短评

■新作快评

王筱喻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潮》 《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9年第4期

王筱喻的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潮》是一部高屋建瓴、格局恢弘、气势磅礴的作品。

作品开篇写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在孔子研究院时,召开座谈会与专家亲切交谈,立意高远、视野宏阔、观点鲜明、笔力矫健。作品通篇围绕总书记再三强调的“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论道”,展现出大境界、大气魄、大立意、大手笔,行文激情澎湃、天马行空、语言晓畅、才情横溢。全篇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伟愿景”为中心,采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创作手法,集文、史、哲于一体,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全面揭示出总书记曲阜之行这一中国历史文化转折点和里程碑的深刻背景及历史必然,其文源之深、文魂之达、文脉之盛、文气之盈、文思之广,令人敬佩。

山东是孔子故乡和儒学发祥地,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习儒风孔子潮》的作者王筱喻是山东人,他的眼睛始终关注着齐鲁大地,以讲好山东故事为己任,笔端饱注对家乡的深情厚意。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尼山重光》追踪了一群乡贤和儒学爱好者,描写了他们对儒家文化的热爱和传承,引起多方关注。较之《尼山重光》,《习习儒风孔子潮》更是时空上大穿越、大跨度、大开合的高难度写作,体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胆识和气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习习儒风中,总书记非常智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高度融合,体现出一个大国领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治国理念,以及期望“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责任使命担当。

是的,一个没有精神追求而只有经济诉求的民族,无法为人类奉献文明财富。儒家最重要、最重视的是“正”,守正创新,将儒学等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一环。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习习儒风孔子潮》的问世,不仅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

□杨海蒂

现代文学里有个著名的“十字街头与塔”的譬喻,周作人1925年宣称自己“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气,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90年后,“十字街头与塔”的格局仍然未变,而周作人式的惬意逍遥却已消失不见。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所写的都是“塔”里的事,而在“塔”中,名为“转型”,实则“内卷”,社会激荡动荡于校园高墙之外,而墙内所有的人却都在原地踏步,直至少年心性磨完。三部曲《裂变》《踟蹰》《天择》以教授、大学生记者、校报编辑为主角,故事都从“何不筑高足,先据要路津”开始,最后以“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落幕。那些最聪明的头脑稠密而拥挤,卷心菜一样向内簇拥,蛊虫一样相向蚕食,只有

极个别者能反向逃生。

三部曲都发生于“鲁南苏北”,距传说中“梁山聚义”的所在不远,但全篇人物却无一有占山为王的气概,其起落行止倒更近乎另一位鲁地老乡蒲松龄笔下的《促织》故事,字里行间各种憋屈。种种筹谋权变、机关算尽,也不过是为了一介副科级、一个副高职。更加可悲的是,除了让身段更柔软下去、手段更恶毒起来,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分别被取名为史真、陈敌和牛万象,这几个名字不可不谓头角峥嵘,而三人的人生际遇则是常鳞凡介、鸡毛满地,人和大学的关系,仿佛变成了污水和洼地的关系。

“鲁南苏北”是传统上的黄淮泛区、流民渊薮,曾有两部写尽国民性的小说将故事安排在这一地区,《水浒》为其一,说是“济州管下的一个水乡,地名

梁山泊,方圆八百里”,大概位于现今的山东省西南;《金瓶梅》为其二,说是“东平府清河县”,内容多涉名城临清风物,大致位于山东省西北。前者是江湖草莽,好汉们号称天罡地煞,但转身就是董超薛霸;后者是市井世情,妻妾们莺莺燕燕,然而却并不长心肝。男人们如狼似虎,想去赚一个世界,女人们如虎似狼,想去争一个男人。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说来去是同一个故事,所谓洼地污水,明清时便已成了面目,而《转型时代三部曲》又在画皮上填了几笔。

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传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

多少浮世多少绘

——读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 □李丹

未曾走远的红云

——读张隼《武汉往事》 □柳江南

张隼所著《武汉往事》之《首义风云》《红色风暴》《抗日烽火》《红旗漫卷》一共4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这部从创作到出版历时7年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为脉络,状写了一座历史名城,三个家族四十载的恩怨情仇,读来荡气回肠。作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圣地,武汉有着悲壮而昂扬的历史文化品格。《武汉往事》以汉口王府、武昌余府、汉阳赵府及其家族成员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与恩怨情仇为故事情节,贯穿于全书的几个主人公,余瑞祥、王俊林、余瑞华、赵璇滢人因为性格、信仰等各不相同,在重大历史关头既是亲人,又是对手,有时携手合作,但更多的是针锋相对,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上演了一曲曲扣人心弦的血腥战争,在情与理的罗网里编织了一段段催人泪下的儿女情长。第一部《首义风云》以武昌起义前后为

背景,从意外暴露计划、革命党人遭到清军围捕开始。危急时刻,新军某部队官余瑞祥往清军头目,致使起义爆发。余瑞祥的人物原型,就是辛亥革命的起义人物,后来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同样是新军某部队的王俊林听说世交余瑞祥参加了革命党,前来投奔,也参加了起义。第二部《红色风暴》写余瑞祥离开军队后,结交了很多穷苦朋友,更看透了政府的腐败。后来,听到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他迅速联络旧部,准备再度起义,但王俊林破坏了。余瑞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去了鄂豫皖,为发展壮大鄂豫皖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部《抗日烽火》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余瑞祥在武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鼓励民众抗战,掀起了抗战高潮。王俊林再一次与余瑞祥走到一起,携手抗战。第四部《红旗漫卷》写抗战结束后,王俊林再度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余瑞祥作为军调处里的共产党高级代表来到武汉,与王俊

林等人展开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监督停战。但是,王俊林受到监视,无法起义。余瑞华在金口宣布起义,封闭了国民党军退入湖南的道路。武汉和平解放。看完四册小说,我们不可能不慨叹,乱世让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家庭、同一个老师门下的人们,为了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追求,出现了巨异的命运。小说通过深入浅出细节和人物刻画与描写,通过深层次的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从辛亥革命到武汉解放40多年的历史中,以三大家族为代表的武汉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中国,他们意志坚定、斗志昂扬,同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及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信念如钢,不屈不挠,坚持以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为重,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的政权,翻身当家做主人。小说虽然写的是武汉人,但所彰显的何尝不是全中

国人的命运和信念?《武汉往事》是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缩影,它宏大的叙事脉络和历史视野,也体现出作者始终坚持的历史观、价值观。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的规律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违背规律的创造。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具有相当的难度,既要求作家忠于历史,又要提炼出历史“御今”的时代意义。从文学的本体而言,更要求作家不要把历史的外衣简单地披在人物身上,而是要把历史的血脉融入人物的生命,最后造就出有性格和血性的人物形象。

张隼曾经深扎军旅生活,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收集与研究,撰写了不少有影响、有分量的历史题材作品,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结的作家。《武汉往事》中,他把历史通过事件和人物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别开生面的史诗气派。